

09

13

文史资料选辑

1980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1980年第二辑(总第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2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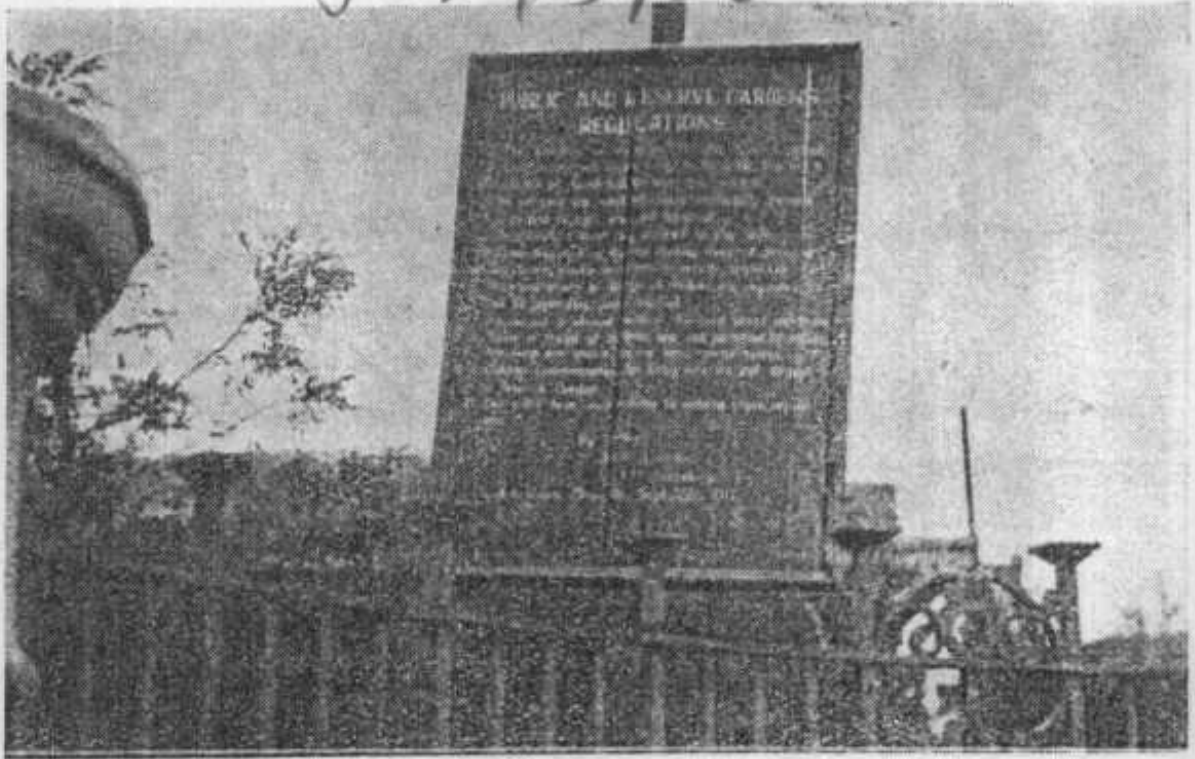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

书号 11074·440 定价(六)0.59元

内部发行

yzt24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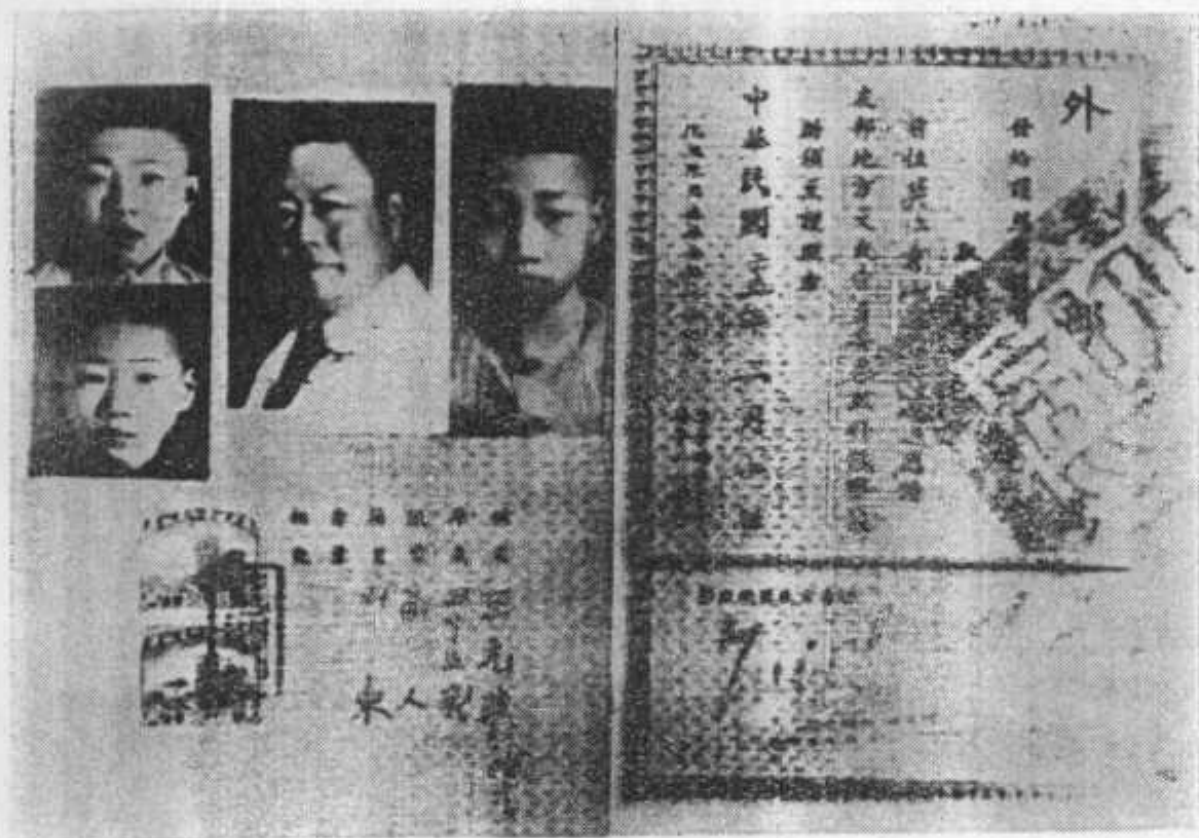
照片下面英文：上海工部局公园通告，拒绝华人、狗与脚踏车入内（设于1926年5月）。照片牌上的英文内容是公园规则，共10条，1911年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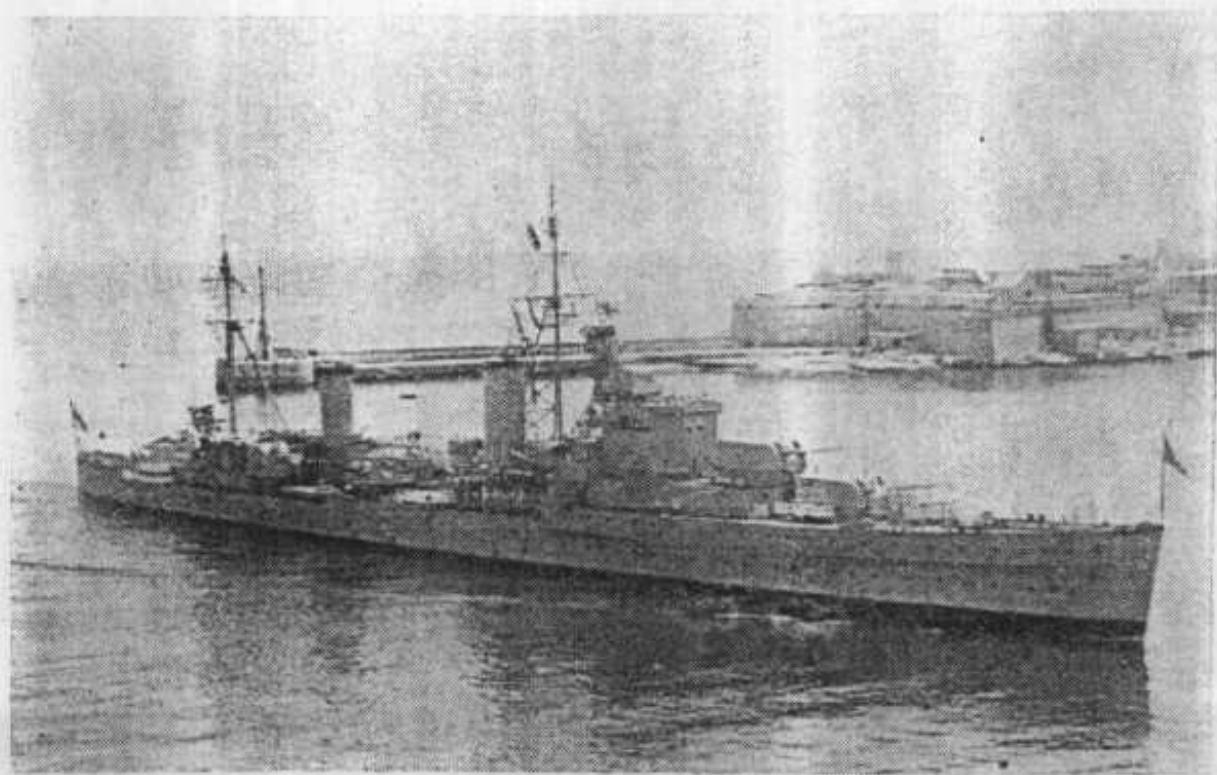
傅全香饰杜十娘剧照



傅全香饰祝英台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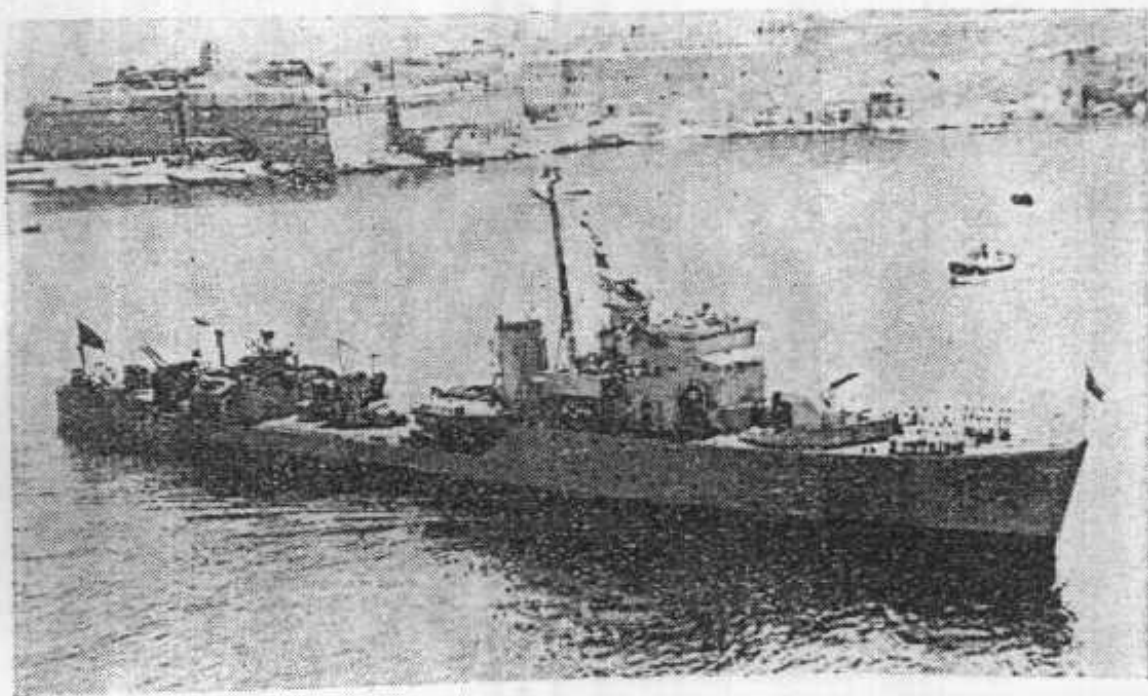


李芒将军携带毛岸英、毛岸青出国护照



起义前的重庆号军舰

重庆号巡洋舰上的警钟



灵甫号驱逐舰在英国港口



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五日重庆号起义后到达解放
区,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在沈阳北陵留影

目 录

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	一大纪念馆资料组(1)
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幼年在上海的一些情况	任武雄、余卫平(4)
长江书店.....	曹予庭(9)
广州起义亲历记.....	薛尚实 遗著(18)
党怎样领导重庆号起义的.....	陈修良(30)
记重庆号起义.....	重庆号起义史料编写组(34)
我在重庆号起义前后的经历.....	张兴昌(52)
党给重庆号官兵指明出路.....	王 淇(64)
上海酒菜业职工斗争史片段.....	朱刚、宋超、罗添、郭旭青(71)
上海闸北贫民区的地下斗争.....	张耀忠(82)
廖克玉谈辛亥见闻.....	许寅、王铿(94)
宋子文和孔祥熙.....	恽逸群 遗著(104)
马寅初先生被扣经过.....	叶元龙 遗著(124)
上海大同大学简史.....	沈德滋、方季石、王槐昌、董涤尘(135)
外滩公园的历史.....	任武雄、许玉林(141)

原
书
缺
页

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们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了来,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1954年3月17日我馆访问包惠僧记录)据张国焘回忆,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家学校里。(《我的回忆》)另外,荷兰人马克斯·佩更斯在所著《亨克·斯奈弗里特——在欧洲和亚洲活动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即马林传)一书中也提到:“代表大会是在法国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进行的,当时该学校的教师和女孩子们正在放假。几天之后,代表们决定在学校隔壁的李汉俊家里开会。”

根据上述材料,可知在召开一大时,博文女校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主要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临时宿舍,是各地代表到上海后聚会和活动的地方。第一天的聚会(或所讲的“开幕式”)是在这里举行的。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不住在这里,陈公博住在大东旅社,也不住在这里,其他代表都住在这里。他们是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于此。

据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的女儿黄允中数年前回忆:辛亥革命后,黄兴做南京留守处主任,她的母亲黄绍兰(即黄朴君)也参加留守处工作。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一九一七年张勋闹复辟以后,她到上海办博文女校。董事长是黄兴的夫人王宗汉,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等人都支持该校工作。李书城、李汉俊和黄绍兰都认识,是湖北同乡。

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北大文学系教授,和林琴南等主张复古。他也是湖北人,董必武同志认识他。

博文女校创办时,地址在贝勒路弄堂内(今太仓路北面)。后来黄绍兰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学校停办。一年后,黄

绍兰回沪继续办博文女校，地址在蒲石路（现长乐路）。又一年后，迁白尔路（后改蒲柏路），即现在的太仓路。博文女校是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二一年搬到太仓路的，当时学生约一百人左右，是全日制。中学部没有男的，小学有男生，但不多，是复式制，一个教室中有两个班级。一·二八抗战前，在附近增辟校舍，学生最多时达三百人，约于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停办。

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幼年 在上海的一些情况

任武雄 余卫平

关于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和他们的弟弟毛岸龙幼年时期在上海的情况，过去社会上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岸龙因在转移中失踪了，岸英、岸青从此流浪在上海街头”。①有的说，岸英、岸青、岸龙兄弟三人幼年生活艰苦，受到牧师老婆的种种虐待后出走流浪②等等。

关于他们三人幼年在上海的情况究竟如何，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现在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材料，介绍如下。

中共一大纪念馆保存有一张上海大同幼稚园部分幼儿合影的照片，其中有岸英、岸青、岸龙三人。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三人当时的情况，我们曾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六月二十三日两次访问了大同幼稚园负责人董健吾先生的儿子董寿琪。董寿琪同志五十七岁，在上海内河航运局航道工程队工作。他的父亲董健吾，早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上海解放后，任市人委参事室参事，

① 见《人民文学》1978年第二期刘松林《毛主席的好儿子——毛岸英》。

② 见《儿童文学》1978年第三期金振林《毛岸英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病逝，一九七八年八月平反昭雪，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董寿琪是董健吾的小儿子，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期间，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生活近四年，后来又和他们同往法国巴黎。他比岸英小一岁，所以在这段时期里，对岸英、岸青的情况比较了解。

据董寿琪同志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同志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牺牲后，留下了八岁的岸英、六岁的岸青和四岁的岸龙。为了摆脱敌人毒辣的迫害，在党组织关心和安排下，岸英等兄弟三人含泪告别了亲人外祖母等，由舅妈李崇德同志带到上海。经地下党组织帮助，由毛泽民同志与董健吾取得联系，于一九三一年进入党所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大同幼稚园的负责人是董健吾，当时他以基督教王牧师的身份为掩护，搞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间，他曾设法秘密为宋庆龄同志递送信件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通过老同学的关系，认识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借用张学良私人飞机到了延安。到达延安时，由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同志接见。相隔数日后，又秘密护送斯诺去延安。埃德加·斯诺在所著《西行漫记》中，曾叙述了王牧师当时的活动情况。

大同幼稚园的开办，主要是为了帮助在白区工作的党的领导同志和被反动派逮捕的同志的子女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当时入园的除了岸英、岸青、岸龙外，还有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同志的子女。为了便于掩护，对外也吸收少量幼儿入园。园内的管理和保育人员，都是地下党员的家属，比较可靠，董健吾的爱人黄慧光也是该园保育员之一。园址原在上海江宁路武定路口，后迁南昌路

复兴公园后门，以后改为小学校舍。现在我们保存的照片，是当时大同幼稚园部分幼儿和保育人员的合影，其中第二排右第一人是毛岸英，第二人是毛岸龙，左第一人是毛岸青，穿黑色衣服的是黄慧光。

岸英、岸青和岸龙到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岸龙因年小体弱，突患痢疾，高烧数日不退。该园负责护理的程凤仙将他送到广慈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去世。

一九三二年，该园保育负责人桂荷英有一天早上外出，一去不返，下落不明。这一失踪事件发生后，园的负责人王弼（那时董健吾另有任务去武汉工作）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经组织研究，决定立即解散幼稚园，把有亲可投的幼儿分散各处，同时决定把岸英、岸青兄弟安排在董健吾家中，在党组织经常关心下，由黄慧光负责扶养。

为了兄弟俩的安全，自一九三二年幼稚园解散后，直至一九三六年四年内，董健吾的居住地点搬了三次，第一次住在凤阳路修德里，第二次迁到成都北路三多里，第三次迁到牯岭路斯盛里。当时岸英、岸青在董家，对外以亲戚关系称呼。为了减少与外界接触，两人都未进学校读书，由董健吾的女儿和儿子在每天放学后，给他们辅导功课。兄弟俩生活在董家，开始由组织上贴补生活费，后来白色恐怖严重，组织上经济也很困难，接济不上。因此，董家七口人（包括岸英、岸青）的生活来源，除了董本人公开职业的有限收入外，其余由其妻女替人家做纸花、缝补等收入补助。约在一九三四年，岸英曾患伤寒症，接着岸青出麻疹，幸而黄慧光（她自大同幼稚园解散后，一直家居无工作，一九七四年病逝）及时把他们送医院治疗，并耐心护理，不久，兄弟俩很快恢复健康。

一九三六年，岸英十四岁，岸青十二岁，组织上考虑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准备替他们改变环境，争取出国读书。此事，董健吾在西安与张学良见面时，随便谈起过。不久，张学良来上海，董健吾去看他，顺便把赵四小姐^①需要的二十几件名贵古董带给他。这次会谈结果，张学良同意资助拾万法郎，支持革命子弟出国求学。董健吾把这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当时党的领导人是刘子华同志，解放后曾任农林部副部长)，经党组织研究，同意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一同出国。最后由刘子华同志和董健吾与张学良碰面，张交给拾万法郎支票。

当时出国人员共九人，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将军率领。除岸英、岸青、董寿琪三个孩子外，还有一个姓赵的师长，一个姓刘的营长是李的副官，其他是翻译和秘书。李杜出国的目的是绕道欧洲到苏联，到中苏边境重新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岸英等小孩名义上作为他的家属，借机带往苏联。当时李杜以王元华假名向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申请去法国。现在我们还保存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给他的赴法英意等国护照的照片，批准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左上角照片四张，王元华(中)两旁是岸英、岸青和董寿琪，下题王元华年龄、职业、籍贯等。

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乘法国邮船康脱罗梭号离沪出国，先到巴黎。在巴黎时，刚开始三个小孩生活不习惯，李杜同志耐心进行工作后，慢慢习惯起来。他们为了设法搞去莫斯科的护照，花了半年时间，最后苏联大使馆只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兄弟俩是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与大家握别的。其他人只好就此回国。

^① 张学良身边的人。

一九五〇年六月，毛岸青同志曾给董寿琪一信，说到“在巴黎一别，我和岸英去苏联后，就进入国际教养院读书，后来岸英进入大学，我中学未毕业……”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毛岸英同志给外祖母的信中谈到“一九三二年与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这个“流浪生活”似可理解为泛指，即远离家乡和亲属，饱受颠沛之苦，不一定是指流浪街头。

以上是董寿琪同志的回忆，我们未深入调查，过去也未向刘子华同志了解（刘子华同志已去世），希望瞭解的同志补充、核实。

长 江 书 店

曹 予 庭

长江书店是中国共产党继上海书店之后设立的又一出版发行机构。

党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曾在上海设立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多种马列主义书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在那时军阀跋扈的白色恐怖下，上海书店遭到迫害，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被孙传芳以所谓“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非法封闭^①。

上海书店被封闭后，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只得转入地下，这对党的宣传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中央认为需要再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时，长江一带的形势日渐好转，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蓬勃开展，武汉的革命气氛尤其强烈，于是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据当时负责上海书店的徐白民同志回忆，关于上海的工作，中央暂时交给毛泽民同志负全责，因为当时毛泽民同志还负责一个秘密发行所和印刷所；长江书店则仍由徐白民同志筹建。不料徐在临行前突患重伤

^① 见拙文《上海书店——党的早期出版发行机构》，刊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

寒,只得改由苏新甫同志负责。这就是汉口长江书店建立的缘由。

长江书店设在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济生马路口,兼办出版和发行工作。同时,还设立了一个长江印刷所,地址在济生马路的福生里内。长江书店成立的时间,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45、146期合刊上所载的一则广告来推算,当在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这则广告特别标明:“继承上海书店营业”。

汉口长江书店成立后,继续把上海书店(包括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发行的书刊推广发行。此外,还销售其他书店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在当时革命气氛浓厚、各界民众反帝反军阀运动日益高涨的汉口,受到群众的欢迎。据苏新甫同志回忆,当长江书店开幕时,所有由上海、广州运去的书刊,三天之内完全售光,由于添配的书刊一时应接不上,曾经一度拉铁门,其盛况可以想见。

长江书店除重印新青年社、上海书店等一部分书刊外,曾出版许多新书,并开始翻译出版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计五十多种,对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各地工农群众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影响十分深广。

党中央对长江书店的设立及其工作的开展十分重视。当时,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党以国民党名义创办了《民国日报》,由董必武同志任经理,对革命书刊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经常关怀。恽代英同志在《计划一九二七年的工作》一文(刊《中国青年》第148期)里,谈到这一年要开展的宣传出版工作,准备出版九种书籍,如《资本主义浅说》、《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浅说》及《中国青年》、《向导》等,都是由长江书店出版的。